

湖北教育史

H U B E I J I A O Y U S H I

(上卷)

熊贤君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

九五

规划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周玉良主持

湖北教育史（上卷）

《湖北教育史》编委会名单

主任：邹时炎

副主任：余凤盛 孙德华（常务） 张继彬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教育史 上卷/熊贤君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351-2493-3

I. 湖… II. 熊… III. 教育史-湖北 IV. G52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411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字数:503千字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5 插页 20.75 印张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51-2493-3/G·2042

定价:2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绪 论

《湖北教育史》分上下两卷,上卷(远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下卷(1949~1997年)。全书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湖北教育从古到今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评价与湖北教育相关连的主要人物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有影响的教育事件等,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湖北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它作为地方区域性的教育通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的一部分,因此,既要正确地反映国家教育政令、法规作用于湖北教育的方面,又要深入地研讨和反映地方区域性教育的特点,以及它在教育总体中的影响,而后者更是地方教育史要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

据考古的文物与研究证明,湖北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进入阶级社会和有文字记载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们就曾经涉足于湖北这块土地,并留下了不朽的历史遗迹和美好传说。关于“湖北”,自从明代建湖广省以后,湖北和湖南合为明朝廷的行省之一,其中湖北的辖区与今湖的范围基本相同。

但是,明代以前湖北的管辖区域,则应该作一点说明。

《湖北教育史》,上限从楚国开始,然而,历史上的楚国比湖北的辖区要大得多。楚国版图最大时,北有河南汝阳道十之八九;中有湖北、安徽、江苏三省,还有山东省济宁道的泰安、兖州二府;南

有江西省寻阳、庐陵、豫章三道及湖南全省；东有浙江省之钱塘、金华、会稽三道；西有陕西省汉中道及四川省东川道之半。《湖北教育史》上卷所考察审视的，不是“半天下”的楚国，而是大抵相当于今之湖北范围的楚国。

汉代行政区划有一些调整。景才瑞、邓先瑞主编《湖北省志·地理(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记载，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刺史部，湖北大部分属于荆州刺史部。湖北北部南阳郡属地有大洪山以北的应山、郧县等地；东部有江夏郡(治所在安陆，后迁至西陵新洲，辖区相当于黄冈市、孝感市、武汉市及咸宁市；西部的南郡(治所在江陵)，辖宜昌、荆州、襄阳和恩施等市州。此外，鄂西北一小部属汉中郡，鄂东隅为扬州刺史部，属庐江郡(今安徽省境内)；鄂南郡边境的通城属长沙国。西汉时新置的县有沙羨(武昌)、蕲春、下雒(阳新)、安陆、云杜(京山)、高城(松滋)、巫县(巴东)、夷道(宜都)、夷陵(宜昌)、秭归、临沮(远安)、舂陵(枣阳)、长利(郧西)、武陵(竹溪)、枝江。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改郾为宜城。东汉时，“州”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湖北辖区内所涉的有南郡、江夏、南阳、汉中、庐江、长沙等郡。新设有寻阳(黄梅)、下隲(崇阳、通城)、佷山(长阳)、孱陵(公安)、编县(荆门西北)、中庐(南漳)等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干戈不息，战争频仍，五胡侵袭、同室操戈，湖北大部分地区成为各国交争的古战场，行政建制也多有变化。隋唐后在行政区划方面作了进一步调整，推行州县两级行政制度。除西部分别属于豫州、梁州；东部一隅属扬州所领辖外，湖北大部均属荆州。开皇九年(589年)，江夏一度改称鄂州，治江夏，后来鄂州又成为治所。这就是湖北简称“鄂”的由来。唐代置荆州大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是为监察机关。鄂西部为山南东道(治所襄州，今襄阳)，东部为淮南道(治所扬州，今江苏境内)，东南部为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

西南部为黔中道(治所在黔州,今四川彭水)。武德四年(621年)改江夏郡为鄂州(治所在江夏,今武昌),改京山、富水(京山县北境)等县为郢州(治所在长寿,今钟祥)。另外,还有襄、随、均、房、峡、归、复、全、蕲、安、黄、沔等15州。至德二年(757年),设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统襄、均等9州,荆南节度使领荆、郢等10州。后又置武为节度使,领鄂、蕲、黄诸州。

宋代改唐道为路,在全国设十五路,后增到二十三路。路下有府、军、州、县建制。湖北中部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这就是“湖北”二字的由来。(见景才瑞、邓先瑞主编《湖北省志·地理(上)》第83页。)湖北路辖33县,管辖湖北大部分地区。其它府、军、州、县隶属于京西南路、淮南西路、江南西路、夔州路等。元代在地方设十一行中书省,湖北境内长江以南属湖广行省,长江以北属河南行省,西北部一隅属陕西行省等。

明清时期,省的建制基本固定下来。明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称为行省,简称省),全国分为十三个布政使司,司下设府、县。湖北全境基本上属湖广布政使司(治所在江夏,今武昌),下有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郢阳8府;鄂西南极小一部分属四川布政使司。清承明制,以洞庭湖为界,南为湖南布政使司,定名为湖南省;北为湖北布政使司,定为湖北省,是为湖北建省之始。清初湖北统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郢阳8府。雍正六年(1728年),升荆州府之归州为直隶州,统长阳、兴山、巴东3县;又改施州卫为恩施县,由归州领辖。雍正十三年,升荆州府之夷陵州为宜昌府,以州地置东湖县为府治。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升安陆府之荆门州为荆门直隶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汉阳县夏口镇为夏口厅;三十年升宜昌府之鹤峰州为鹤峰直隶厅。到清末,湖北省共有武昌、汉阳、安陆、襄阳、郢阳、德安、黄州、荆州、宜昌、施南10府和荆门直隶州、鹤峰直隶厅共60县、6散州和1个散厅。

中华民国时期,湖北省内部过制仍在不断不断变更。辛亥革命后,废府设道,湖北设江汉、襄阳、荆南、荆宜、施鹤诸道,统辖 69 县。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改武昌县为武昌市,改夏口县为汉口市。1927 年 1 月,国民政府迁汉,武汉三镇划为京兆区,将汉口、武昌市合为武汉特别市。1929 年 7 月,武昌、汉口分治,设置汉口特别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1931 年,改汉口特别市为汉口市,划归省辖(1932 年恢复)。1937 年,改武昌市政处为武昌市。抗战胜利后,设武昌市政筹备处,含汉阳城区;改汉口特别市为汉口市,划归省辖(1947~1949 年改为国民政府直辖);汉阳区改属汉阳县。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北省共设武昌市 1 市、8 行政督察区、69 县。

192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麻起义胜利后,诞生了湖北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此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抗日民主政府等。

1949 年 5 月,武汉三镇解放,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 月 24 日,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统一建制为武汉市。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分设的一级行政机构——中南区军政委员会成立,驻于汉口。湖北省由中南区军政委员会领导,武汉市为中央直辖市(1954 年改归省辖)。新中国建国初,湖北省管辖有 8 个专区(黄冈、孝感、襄阳、荆州、宜昌、沔阳、大冶和恩施)、4 个省辖市(宜昌、沙市、黄石、襄樊)、1 县级市(老河口市)、71 县、1 镇(武穴镇)和 1 个矿区(应城矿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改革和湖北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建市代专区的行政区划改革,将黄冈、孝感、荆州、宜昌、郟阳、咸宁 6 个专区改为市,由省管辖,改恩施专区为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还将 20 多个县改为市(县级)。

以上便是各个历史时期湖北教育的舞台,湖北教育萌芽、破土、兹长、发展的热土。自强不息的荆楚人民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

文化活剧，谱写了一部又一部辉煌壮丽的教育诗篇。

(二)

湖北教育从楚国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与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形态，为荆楚文化教育打下了基础。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北地区，号称“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经济发展较快，“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国力日益强盛。它不仅出兵问鼎中原，而且势力所及达到了半个中国。在建国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智慧的楚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天文学家、建筑学家和技术精湛的工匠等。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明也有很大影响。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置郡县”。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这一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历史上的湖北地区，在秦、汉以降，直至宋、元、明、清诸皇朝的治理下，其行政区划的名称与管理范围有一些比较大的变迁，辖区内的学校教育事业，随着朝代更迭与皇权的兴衰，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态势，但总的趋向是在缓慢的发展。学校教育的格局与全国也基本一致。辖区内一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有时发展快一点，培养出的人才多一点，并形成某些地方特色。如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辖区内兴学的记载较多。东汉末年，刘表治理荆州期间（190～200 年），在襄阳设置官学，并召集儒生集体编写《五经章句后定》一书作教科书，这是此前所未有之举。东晋成康元年（335 年）庾亮任荆州刺史，在武昌（今鄂州）“盛修学校，高选儒官”（《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孟嘉别传》）。南齐建元二年（480 年）夏，荆州

刺史萧嶷在江陵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收生徒 40 人,这是江陵兴办学校最早的记载。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繁荣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开创和逐步完善的阶段,它对中国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影响极大。唐代京师和州县的学校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湖北辖区内的荆、襄等地,由于过去有重教兴学的传统,这时期的州县办学进一步向边远地区扩展,如唐开元年间,房州刺史韦景骏在房州(今房县)除淫祀,修学校,开贡举(《旧唐书·韦景骏传》)。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培养、选拔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襄阳、荆州等地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多,荆州的进士刘泊、岑文本和襄阳的进士张柬之,还当了朝廷的宰相。同时,还孕育出诸如孟浩然、皮日休、崔道融、段成式等一批文学家。

宋、元时期,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之一。学校教育和科举制也继续向前发展。宋以前,州县设立学校者凤毛麟角,而且兴废无常。宋代较大规模地兴办地方学校,尤其是书院,几乎普及到各主要州县。庆历四年(1040年),朝廷规定学员满 200 人的州县,皆可设置学校,以后又多次加以倡导和推进。学校和书院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元代湖北地区的学校与书院有较大发展,特别是书院的发展更快,而且规模日益扩大,有的书院置学田近 1000 亩,院舍数十间。大多数书院都讲授朱熹、程颐和程颢等人倡导的理学。

明代和清代前期(至鸦片战争),是中央皇权集权制进一步强化的时期,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明代湖北地区各府、州、县皆设立学校。乡里设置社学。府、州、县学校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当时湖北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人很多,不仅有声望很高的学者,还有致力改革、蜚声政坛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明朝初年,书院发展受到扼制,中叶以后,书院才得到发展,特别是由于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家倡导私人讲学,各府、州、县乡设书院,湖

北书院进入繁荣时期。书院兴盛,以及书院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思想活跃,因而使湖北的学风一新,人才辈出。清代学校制度基本承袭明代,除设府、州、县学校和乡里的社学外,恩施等少数民族地区设义学。清代初期抑制书院发展,后来书院几乎完全官学化。书院以课试为主,由督抚主持,成了科举制的附庸。书院多办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书院比较少一些。书院的发展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湖北近代学校教育的诞生奠定了初步基础。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力衰弱。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屡屡遭到列强的侵辱,并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湖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社会组织,包括学校教育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中国人民和一些有识之士思考对教育的变革。1889年8月,积极筹办洋务事业的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几年之内,他在湖北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随之而来的是急需培养大批新式的实业人才。据此,张之洞在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从1890年6月开始,陆续改建和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开创了湖北近代教育的先河,迈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戊戌变法”及“新政”时期,湖北的教育变革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全国教育的“示范省”,主因是加快了旧书院的改制和实业教育的发展。1903年,张之洞受清朝廷之命,会同张百熙、荣庆等制订新的学制,即“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颁行实施的近代学制。这个学制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意义是重大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湖北大地上萌生的近代教育,包括实业学校、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军事学校,以及派遣出国学习的留学生教育等,呈现出一派生机,已经创办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各种新式学校,在体制上形成了近代教育的初步格局。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教育,无可争辩地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也为日后湖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制订了发展教育的新措施,包括确定新的教育方针、新的学制等,也得到了湖北地区的响应。尽管道路比较曲折,进展缓慢,发展很不平衡,但许多有识之士仍然在继续努力探索湖北教育近代化的道路,推动湖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抗日战争时期,因湖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或成为战区,国民党管辖区的一批学校不得不迁至恩施、鄂西等山区,乃至四川、云南等大后方。为使湖北教育能够得以继续,湖北省实行“计划教育”,试行“联合中学”制,在艰难困苦时期,培养了湖北的一批抗战建国人才。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苏区、边区,也兴办了大批学校,结合湖北革命斗争实际,因地制宜,开展革命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斗争人才。湖北苏区的师范学校创办历史较早,培养的人才较多,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如湖北监利师范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回顾湖北古代、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有哪些历史经验及其规律值得总结和探讨呢?

首先,楚文化是植根湖北土壤的重要历史遗产。它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和明显的地方特色,是湖北教育的源与根。直至今日,楚文化教育的许多优秀成果,仍然滋润着楚天儿女的心灵,有力地激励着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战胜困难,不断创造湖北光辉美好的未来。

其次,湖北自古代到近代,都是全国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湖广熟,天下足。”广大农村地区过去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在“耕读为本”思想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兴教、读书的优良传统与习俗。而在历代的当政者中,包括一些县官与乡里绅士,顺应民意,积极倡导兴办学校和培养人才者不乏其人。其中许多人身体力行,多有建树。这些历

史上的有识之士的兴教思想与作为,是值得大力弘扬的。

第三,湖北古代、近代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建立的一批新式学校及管理制度,在鄂执教和学习的师生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从严治教”、“严谨治学”、“勤奋求学”、“坚毅朴实”等优良风范,是办好教育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教育资源。正是由于受这种优良风范的潜移默化,使湖北这块热土孕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如屈原、陆羽、毕昇、李时珍、闻一多、李四光、陈潭秋、董必武等,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因此,“唯楚有才”这句话,既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又是对楚天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励勉。大力弘扬“严谨治学”和“勤奋求学”等优良风范,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四,在我国古代、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湖北地区的教育多数时期都处于比较前列的位置。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湖北诸多优越的自然、人文条件等有一定关系。这一点,在一些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镇)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尤为显现。这就证明,湖北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既受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又与荆楚人民长期形成的尊师重教的良好风习有密切关系。

在总结、探讨湖北地区古代、近代教育的历史经验和地方特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严重局限。古代教育的这种局限突出地反映在它的封建性和受教育人群的限制性。就是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产生的一部分近代教育资源,与古代教育相比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抑,教育思想和办学条件等还是比较落后的,严重阻碍着广大人民享受更为普及更为先进的教育。因此,只有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并逐步向整个现代化目标迈进,广大人民才能真正享有接受良好的平等教育的权益。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建国伊始,为适应巩固人民新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需要,湖北省对教育实行“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方针,接管改造旧学校,学习革命根据地教育的经验,创办社会主义的新学校,成功地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使教育面向工农,为社会、经济服务,教育工作取得明显成就。在院校调整中新建了一批高等学校,使武汉地区的大学数量迅速增加。同时,普通中小学有新的发展,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湖北的教育事业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56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湖北教育界掀起了教育方针的讨论,批判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以及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和忽视政治的运动。1958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全面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决定进行教育改革,努力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大胆探索,闯出新路,在全省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兴起了群众办学、集体办学的热潮,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左倾思想错误影响和经验不足,湖北教育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犯了重大错误。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学校的“拔白旗”运动等,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在湖北教育发展速度上,也超过了湖北经济承受能力。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的瞎指挥,浮夸风,

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针对这些错误,湖北省根据中央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经过调整,“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逐渐的得到纠正,很快恢复了教育元气。从1961年到1965年,湖北教育又一次重振雄风。

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成为重灾区,湖北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各级教育行政领导机构被迫陷于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下放劳动改造,受到批判、斗争。教育行政制度被肆意践踏,教育事业处于停滞或倒退的状态。虽然广大干部和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斗争,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成绩,保存了教育的部分资源,但遭受的破坏及其危害是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湖北教育界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推倒“两个估计”,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地位,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建立较完善的教学制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收到显著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以及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有力地推动了湖北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诸如在农村发动集资办学,限期实现中小学“一无两有”,促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小学管理体制,调整布局与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集中政府投资办好几所省属高等学校;进一步落实教师的政策,搞好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等工作,都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并收到一定实效。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进一步促进了湖北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新的提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使湖北教育进入了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主要特点是:加大了改革力度,探索并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多种形式办学为辅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办学

的积极性；高等教育注重横向联合，提高质量与效益，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基础教育以实现“两基”为目标，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坚持依法治教，科学施教，使中小学的办学与教学等行为逐渐规范化，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湖北教育事业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之一。

回顾湖北新中国建立后 50 年教育发展的历史，有哪些经验和规律值得总结和探讨呢？

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湖北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都是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取得的，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不能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湖北解放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接管了旧教育，并成功地进行了旧学校的改造。以后进行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向科学进军、普及义务教育、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党在某些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但均得到了及时纠正。这也证明了党的干部要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善于总结国内外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对教育事业领导的法规、制度和工作方法。

第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随着湖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湖北教育界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大批专门人才，还更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如果学生的素质不全面发展，也难以成为有用的专门人才。从而在教育工作中端正了办学方向，严格地按教学计划开设课程，涌现了一批在全国出类拔萃的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第三，尊师重教，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湖北地区尊师重教风尚绵延数千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理论的指导下,这种优良风气又进一步得到大力弘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师地位与待遇的有力措施,包括对教师工作专门立法。湖北还设立湖北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优秀教师,组织教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优先解决教师住房、民师转正等问题,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激励着广大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保证了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全省中、高等师范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培养合格新师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较好地处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教育既受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又为经济、政治与社会服务,培养所需人才,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较好,促进了互相协调发展。“文化大革命”违背了这一规律,教育受到极大的破坏,使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被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995年,又确立了“科教兴鄂”的战略方针。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要深化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以适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需要。湖北当代教育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除了外部良好的环境外,教育内部各个要素相互协调,互为补充,也是成功的经验,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五,建立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这是保证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历史上的湖北财政状况,时宽时紧,不够稳定。因此,在广大农村,如国家财力不足时,将教育经费集中到县管理,并依法、量力调动人民群众兴办中小学教育的积极性,这是湖北农村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方面,湖北是经验多于教训,应总结提高,进一步完善。

(四)

研究湖北地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及其演变规律,编写高质量的湖北教育史,是发展湖北教育事业的需要,是教育为湖北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项举措,也是湖北历史上的一项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将为各级当政者提供殷鉴,使他们在谋划湖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计时,更加自觉地把教育的现代化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湖北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的位置。这对于社会主义新湖北跨入 21 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人才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湖北是中国腹地大省,幅员辽阔,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各地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也存在有较大差别,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山区,这无疑是在湖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在制定各地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计时,要从实际出发,总结湖北各地过去发展教育的经验、教训,探寻出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教育的新举措,使各地的教育现代化做到有层次、有步骤的推进,最终实现有各地特点的教育现代化。因此,编写《湖北教育史》,各市、县编写各市县教育史,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编写地方教育史,这一项工作本身就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中国素有修史的传统。唐代明君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章学诚修撰《湖北通志》,不仅作育了一代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而且通过《湖北通志》也启迪了大批湖北的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毛泽东、邓小平都倡导干部要学习和研究历史。江泽民提出要藉助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写《湖北教育史》,对于培养湖北人民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